

七、容闳的三次道路抉择及与孙中山的会合

容闳作为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从他少时接触西学起，到 1912 年溘然长逝，其胸中始终满怀着谋求中国近代化的强烈愿望，并为它的实现多有构思和呼号奔走，揆其心路和斗争历程，出现了三次重要抉择，反映了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应合的一种较具典型意义的情形，显示出近代中国那些浸润西方思想而又一心热爱祖国，亟图革新祖国，使之跻于世界先进国家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先驱形象。他的最终归宿，是认同中国出现的共和国理想与现实，与孙中山实行了有特殊意义的会合。



容闳是生长在西方资产阶级正欲按照其面目来改造整个世界、使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大变动时代。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的中国是主动适应世界潮流，进行资本主义改造，以自立于世界诸国之林，还是被动地安于落后挨打，沦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侵略被侮辱被蹂躏的悲惨境地，这是鸦片战后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抉择。

稍早于容闳，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中国近代先贤已开始感受到新形势下的新压力，开始睁眼看西方，谋求学习西方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新危机。容闳跟随而行，但却因其具有不同于前者的思想基础和阅历，故对上述道路作出了更加明确的抉择，迈出了更加矫健的步伐。

第一，他因出生于毗邻澳门的农村，生而贫苦，既蒙受“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的苦难，而又因其深感旧世界苦痛、目击“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以趋应时世的父母的决策，而“入西塾”^①，得以跨出农村，进入西方世界，使他有机缘接受澳门、香港直到美国的较完整的西方教育，从一个贫苦的农村孩子，变为中国第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对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较完全而深刻的感知，因而更有利于他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比较，对中国的出路作出更好抉择。他在其所撰《西学东渐记》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变化：“一个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②显然，他经过对西方的深入了解和更实际的中西对照，不是沉迷于西方世界的优越物质享受，而是更增强了他对于处于穷困落后和灾难中的祖国和同胞的无比热爱和深切关注，更加感到需要竭力从事革新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是基于这种热烈而崇高的感情，他毅然作出抉择：“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③。而此宗旨就是“要使西学传到中国”，“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即以自身“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19—20页。

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也就是说，要尽力造就一批近代化人才，把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国，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文明富强的国家，这就是他“无时不耿耿于心”的为人做事的准则^①。

第二，容闳这种通过实现中国近代化来达到救国目的的思想之所以如此鲜明强烈，是以他对外国侵华、丧权割地所激发的耻辱感和亟图消除殖民统治的使命感为重要成因。他从小就目击“澳门，葡萄牙殖民地也”^②这一事实，后又了解到香港于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他在观览香港形胜后，不胜惋叹：“无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阔，足为英国海军根据地。有此特点，故此岛终不我属，卒为英国有也”^③。他在美国升大学时，为了所学能报效祖国，一度放弃就学机会；大学毕业后又立即奔回祖国；他曾留香港，深感身体为所拘束，后更遭香港律师排挤，愤而到内地谋所怀事业之成。到上海后，他又愤于“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常欺侮中国人，他除怒惩外人骄恣行径外，更深感须急图中国普及教育，使“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力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到那时，“即外人以强权吞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④其后，他赞扬义和团虽系乱民，却是“中国之民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他比之为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船货”，继之以建“公定宪法”的共和国家^⑤；他还谴责西方国家通过对华战争和逼签不平等条约“扰乱中国之工业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实业、

① 《西学东渐记》，第23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7—8页。

④ 《西学东渐记》，第39页。

⑤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74—175页。

政治的发展^①。这些想法虽有的过于简单，但他处处把消除外侮和中国近代化相连接则可以概见。

第三，容闳同情同胞的苦难，其解救办法不是传统方式的袭用，而是图登斯民于近代化社会。他回到广东时，恰值两广总督叶名琛残暴镇压红兵起义，陈尸遍野，惨不忍睹，容闳见状“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及后深思静虑，乃觉此举卤莽，究非妥善之策；不若仍予旧有计划，……循序而进，庶可达予夙昔之希望也”^②。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对“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益甚。每一念及，辄为快快不乐，转恶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益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③。既要脱除封建压迫和痛苦，又必须另辟新径，即不能依赖旧式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农民斗争，而要通过教育，灌输西方观念，使他们了解身受痛苦的真实原因，谋求解除痛苦的更好途径。在他心目中，最好途径就是通过提高人的近代化素质实现国家的近代化。

基于此种抱负，他在1855年8月回国后，适值太平天国运动处于高潮，他曾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将有异于历代仅改变一姓统治而实无重大国体和政治改革的“革命”，具有新的历史精神，因而寄望于此次运动能推行他的中国近代化思想。他谒见干王洪仁玕、侍王李世贤等，提出了建立正规军事制度、设立武备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制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创立银行制及厘订度量衡标准等建议，旨在改变农民运动旧轨，转向发展资本主义新途。这和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意趣基本相同，但都未为农民领袖的群体所接

① 《西学东渐记》，第46—47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30—31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22—23页。

受。他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经过一段考察后，看到太平天国仍未抛掉旧式农民战争的诸多弱点和弊端，特别是他看到了太平天国进入后期，腐败现象滋生，道德每况愈下，壮志销磨，无法除旧布新，使得“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因此，其“殆无改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其事业亦必无成功可望，“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①，即达到兴办教育、培植近代化人才的目的。

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想通过经商致富，实现教育兴国，自亦属空想，但就社会发展方向而言，这是向前看，堪称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一种可贵尝试。马克思于1850年乍闻太平天国于起义前夕已打出类似社会主义的旗号而感到新奇与欣慰，经过一段时间审视后，他终于看清了这次农民起义实际仍未脱离东方封建国家常具有政治上改朝换代而社会仍然停滞不前的特征，没有提出建立新社会的任务^②。而他在随后论述中国问题时，多以研究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内因以及该如何打破封建性的自我封闭经济，加强与世界联系，投进世界近代进步潮流的问题。孙中山始终十分赞赏洪秀全的反清事业，他还多次讲到太平天国实行过共产制度，但是他也多次指出太平天国的封建化及其造成的恶果。太平天国的以农民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公仓”制度虽亦是他构筑平均地权的一种历史参照，但他最终采纳的是可以在中国条件下清扫封建土地所有制，促使中国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容闳诚然与马克思、孙中山在观察中国社会的深广度及其谋求中国进步的方案上有差别，但都着眼于中国的革旧图新，谋求使中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中世纪国家为近代国家，这无疑是一种合乎世界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抉择。

^① 《西学东渐记》，第62—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8页。

二

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必须有政权近代化的保证。19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蹒跚出现和西学日益东渐之后，就继中国社会上原已展开的顽固派与洋务派之争，又出现了中体西用与变中体为西体之争。这场究其实是让封建地主阶级继续主宰中国还是由新兴资产阶级来主宰中国的国体之争，是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第二个重要抉择。

容闳教育兴国的近代化思想固然未能在农民的天国中付诸实施，也因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尚未出现而找不到阶级依托。他抱着经商致富以兴西方教育的设想刚想举步，却很快落脚于太平天国的对手曾国藩的幕下。历史的发展就是如此看来不可思议却又合乎发展逻辑，鸦片战争时期及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因未掌握实权，学习西方以兴国仅属微弱呼声，归附或拟归附于农民天国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虽想承此发展为治国要策亦归空图，只能寄望“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它一定会复生”^①。这种遗愿却由掌握了部分政治权力而又通过经世致用了悟到这种需要的曾国藩等人继承了下来。容闳如此口述他投入曾国藩幕下的过程：

予居上海，西人多不直天国军所为。谓立国有年，官全不知政事、学问，兵皆起于土匪乌合，仅藉教条为护符，又不明教义，助之实难。予乃变计往官军大营，谒曾国藩，一见问予出处，谈中国大事，询外国政学，要言不烦，井井有条，不觉心折。遍访幕中宾客僚属，风采学问，人人皆南京所见之梅老先生也。观其治军方法，统方面者皆用文人，领偏裨者皆用武人，隐寓战胜后为收拾地方人民准备，颇与现时欧美战策相

^① 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合，遂倾心从之。^①

这段口述资料当属可信，益之以《西学东渐记》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容闳之由投效农民天国到转投其敌方是由于：

第一，他虽同情农民困苦，但对太平天国的执政者已深为失望，而他所亲近的西人又多不直太平军所为，更促使他与太平天国疏隔。

第二，曾国藩讲求经世致用，此时更开始瞩目于西学西器的采用，又有与他在运用西学已相应合的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一批当时著名的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汇集在他的身旁，所以容闳认为曾一旦平定太平天国，即能收拾人心，促进地方近代化建设，“颇与现时欧美战策相合”，可倚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第三，容闳虽熟悉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以争得美国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历史，但在当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具有此种物质和精神的力量可以凭恃。而他根据自身留学经历，最深切的体会是要实施西方教育，灌输西方观念，为西方式的变革作准备，即主要的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农民起义那种暴风雨式的摧毁旧政权而又不会导致新国家创造的暴烈方式。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捞取了部分地方权力且对中央政权日益扩大影响的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地主阶级洋务派，亦恰需利用像容闳这样通晓西学西情的人，来为他们办洋务，这就出现双情相投的某种契合。

第四，容闳虽出身于社会下层，及长，逐渐与西方传教士、商人、知识阶级交往，挤入中上层社会；其贫苦母亲亦望子成龙，改善家庭处境；而他进入中国社会的经验又一再表明，没有权势和财力是办不成事的。如此等等，驱使他对权力的某种依附和自掌权力的希求。诚然，这种依附和希求主要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便于实施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而洋务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在

^①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第112—113页。

一段时间确为他提供了一定的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权力和试验场所。1863年他被曾国藩授官五品军功，派赴美国采购机器；1865年，他被授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行政署充译员；1870年更因曾国藩、李鸿章合奏批准任派往监管留美学生的副委员。1872年率第一批留学生30名赴美，至1875年共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实现了他多年来培养中国近代化所需人才的夙愿。在这期间他还兼任过驻美副公使，派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争回一些权利；创办过上海《汇报》（后改为《彙报》、《益报》），延英人马格里为主笔，介绍和宣传西学。

应该肯定，这些对中国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近代化起过一定作用。就拿他们热衷而又主要从事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这件事来看，即便绝大多数因故而中辍学业，未达原定目标，但终于培植了一大批对随后中国近代化进程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从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些已有许多文章论及，毋庸赘论。

然而，容闳决不能算洋务派人物，他只是在兴办洋务事业的一些方面与洋务派同道，究其目标则系要改革现行封建体制，以求得西学的全面输入，中体得到西式改造，即资产阶级主宰中国地位的确立。这就构成了他洋务派的系列矛盾、冲突，乃至最后决裂，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派遣留学生问题上。

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之所以支持派遣幼童留美，其目标是希望周知“西人擅长之事”，“然后徐图自强”^①。实际上，仅限于科学技术和制作等物质层面，而仍要维持中国的传统封建纲常伦理，不准受染于西方的民主平等学说。所以派遣留学生之初，即派翰林出身精通封建伦理的陈兰彬为正委员，“其人沉默静穆，对于一切事物，皆持哲学观念，不为已甚。其于前人布置已定之局，极

^① 《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

不愿纷更破坏之”^①。1876年因陈兰彬荐派继充正委员者先后为区谔良、吴子登，均亦为翰林，容闳称吴“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②。这些人都对自然科学稍有兴趣，即不反对“西用”，但始终坚持“中体”不能变，对留学生的言行管束监督极严，习惯于专制压力，强调服从。而留学生则相反，“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况彼等即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③。即要摆脱旧伦理观的束缚，崇尚自由平等，其发展必然是要求改变国内现行体制，以实现欧美政治制度为归向。浸润美国民主思想的容闳自表支持，他赞同留学生提出的废除向长官跪拜叩头、穿西装、多上科技课，少上封建伦理课等正当要求，但遭到陈兰彬、区谔良、吴子登等人的反对。吴子登更迭向清政府报告，指责上述要求是“适异忘本”，“离经叛道”^④，“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⑤。同时对容闳大肆诋毁，说他和美国人打得火热，纵容学生淫佚放荡，鼓动学生反对师长，随后借口美国掀起排华浪潮，提出留学生不宜留美，应予全部撤回国内，容闳争之无效。1881年夏，绝大部分留美幼童终于“一一悉遣回，竟如瓜蔓抄”^⑥，容闳旋亦被撤职。

容闳经此沉重打击，加上妻子长期患病以至病故，两儿年幼待抚，直到甲午战前十余年间，似处于消极观望状态。但正如他后来

① 《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④ 《西学东渐记》，第104页。

⑤ 《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⑥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三，第21页。

所述：“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①，所以这些被遣回的留美学生虽有的怀才不遇或学非所用，但仍多能奋志于中国各项革新事业。容闳到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又缘此“爱国心油然而生”，向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献借英款购舰以抵日本侵略之策，但遭到李鸿章的反对而未成。随后，容向张之洞进献“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中国行政各机关的新政策，张以其涉及政体改革，“又嫌其太新太激烈”，未采纳。至是容闳清醒地认识到张之洞坚持“中体西用”，难以更动，因而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实际上是断绝了与洋务派的关系，而转向于赞助已揭幕的戊戌维新运动。他的北京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②。

本来，19 世纪 70 年代后，维新思潮已逐渐兴起，容闳于 1874 年—1875 年间在上海所创《汇报》，鼓吹“改良社会”^③，兴办近代企业。其所瘁心从事的留学教育，更是以改革现行政体、促进中国近代化为目标。这就使得他和许多维新人士一样与洋务派有合有离，终于在要不要改革现行体制的问题上，作出了与洋务派“中体西用”相异趣的进行维新变法的抉择。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内情况毕竟了解得少，他未能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巨子那样在维新变法政坛上叱咤风云；而他对美国“豪杰巨人”之谋“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以及发动南北战争，“清除私见，能见其大，公定宪法，成立国家”^④，即对完成美国式的民主革命、

① 《西学东渐记》，第 110 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 122 页。

③ 转见徐松荣：《维新派和报纸》，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44 页。

④ 《世载堂杂忆》，第 115 页。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十分了解，并特别歆羨，又决定了他在中国共和革命的时机趋于成熟时，会出现新的转轨。

三

近代中国道路抉择的复杂性，在于风云变幻急骤，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往往并存而交错，这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更为明显。洋务运动虽经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破产，但清政府为谋自救而于 20 世纪初推行着“新政”；戊戌政变虽宣告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君主立宪运动一直延续为摧垮清政府的一股力量；孙中山革命虽于 1894 年兴中会的成立拉开序幕，而其成为人们瞩目的主流则在 1900 年之后。这种情景，确给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而且上述几条道路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显示中国必须走近代化道路的趋向，何去何从，的确费人考量和抉择。

容闳作为崇信美国共和革命精神的人物，应该说本能地存在着选择共和革命道路的趋向，然而他的美国式理想必须和中国实际相应合才能发生相应效应，而且他必须在中国现实社会找到实现这种理想的同道者和社会力量。可是，终 19 世纪，容闳曾找到的并图倚以实现其中国自谋富强的抱负的太平天国、洋务派和维新派，都先后失败。1895 年，作为容闳之族弟又是第三批赴美留学生的容星桥（名开，又名耀垣）于香港加入兴中会。容闳是否与闻，尚乏资料说明。据容闳对刘成禺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他已看到“中国下层愚氓，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清廷能以诚信仁义，引导其动，可免扰乱；否则，必有大革命之一日。……孙逸仙自伦敦释回，访予谈数日，予亦以此义告之。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常勸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①。据日本

^① 《世载堂杂忆》，第 115 页。

外务省档案记载，容闳与孙中山首次见面系 1900 年 9 月初与孙同乘船离上海赴日本，在日本长崎上岸后又在旅馆进行了长时间叙谈^①。揆诸上述谈话内容，亦应为该时。但容始知孙中山的为人和主张，则肯定早于此时，至少是在轰动国内外的 1896 年 10 月孙中山伦敦蒙难之时。此事件发生后，与容有交往的人士如英人赫德、李提摩太，美人林乐知、香港谢缙泰以及一些维新派人士都对孙中山发表过或称誉或诋毁的评论，这些也肯定对容闳对孙中山的认识和态度发生过正负面的影响，而且以负面为主。比如，孙伦敦蒙难后，林乐知于《万国公报》刊载《拘禁逸犯》一文，訾骂孙“谋为不轨”、“种种悖谬，其罪亦重”；赫德亦认为孙系“发动叛乱，……完全不值得同情”；李提摩太亦认为孙“论点错误，……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②；香港兴中会成立前后即对孙抱有偏见和宗派主义情绪的谢缙泰，更对容闳施加了较长期的对孙不信任的影响。1900 年正需各派加紧联合、利用时机共同推翻清政府之时，容闳以其和各派均保持较好关系，又主张各派联合，致被在上海组织的国会推为会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孙中山因力主“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也表示容闳可“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③。容闳的前引谈话，堪可表明容、孙对时局的观察和处理方针大体一致。但由于这时容和康有为的关系相当密切，而又认为孙“太轻率”^④，所以容闳在 1900 年后一段时间的言行，虽有改变满族统治，“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的意向^⑤，但其行动则尚依违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二途之间。1903 年 1 月，认为“对于中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237—239 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第 129—131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98 页。

④ 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8 页。

⑤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77 页。

国和中国人，‘共和国政体’的政府形式太先进了”^①的谢纘泰，策动了大明顺天国的广州起义，表示以“专为新造世界”、“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为宗旨^②。容闳对此举表示支持，愿为竭力争取美国人的同情和援助^③。在1907年前，容闳与康有为的联系和支持亦仍保持。1903年后一段时间他与美国军界人士荷马李、财界要人布思联络筹款和组织维新军，即系应保皇党之要求。1903年4月，梁启超到哈佛市往谒容闳，容“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④。

可是，1905年后，容闳的亲康疏孙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1907年，他开始提出促使中国革命成功的计划，1908年开始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⑤。1909年1月，容在致友人函及面谈中均认为康“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指责康移华侨捐款为私用是“自己伤害嘲弄自己”，并认定“康有为内心更加关注的是政治权力、权势和财富，而不是改造中国”；而孙中山则是“很重实际的人物，为广东之干城，如加以支持，其计划当可实现”^⑥。因此，他把前此介绍与康有为等联系的美人荷马李、布思转介绍给孙中山，并提出在美筹集约5000万元美金的巨款，来实现在中国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红龙计划”。这一计划虽终未实行，但容闳由较长时间依违于革命与君主立宪二派之间，最终定位于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抱病写给谢纘泰的几封信中，明确表示：“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该由骑墙派和卖国贼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06页。

② 《孙中山与革命史料专辑》，第309页。

③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15页。

④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2页。

⑤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19—320页。

⑥ 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载《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杨树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2页。

(按：在函中指明系指受列强左右的袁世凯、唐绍仪一伙)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要使中国人民“紧紧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给子孙后代开辟“一番壮丽的事业”；他希望看到孙中山能当选共和国大总统，希望健康好转时，回国“参观这个新共和国”，“能够和其他所有其他革命领导人亲自认识认识”，而“他们的名字铭记于人们的心中，应该受到人们的纪念”^①。

容闳在进入 80 岁高龄时作如此明确而坚定的又一重要抉择，还是缘于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情形，和他紧抱的“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即日日应办中国人之事”的始终热烈的主观愿望，因而到晚年仍为中国的新生和近代化而执著地追求。那末，到这时，新的情形和中国人应办之事是什么呢？

首先，1900 年，有如容闳在后来认清的清政府是由“掠夺成性的列强”控制的政府，时代要求“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吁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②。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通过武装革命推翻列强支持的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建立一个保证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共和国，已逐渐成为时代主流，也是当时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最佳选择。

其次，1900 年两派有过容闳所期待的联合反清尝试，但到 1908 年虽仍“建议维新党联合起来”，但同时又“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③，即新的联合已排除君主立宪派。武昌起义后，容闳更清醒地看到君主立宪同中国“过去的情况更为一致”，和古老的“民族传统和习惯观念比较谐调”，因而易于被像袁世凯这种的野心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323—326 页。

②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323—324、320、324—325 页。

③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320 页。

家，乘机“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所以“必须把他和满洲一齐撵走”^①。应该说，这种究竟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来使中国新生的认识的转变，决非偶然，而是基于对两派力量的消长嬗替的较深刻体察。1900年后，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虽在鼓吹自由、民主方面继续为民主革命潮流推波助澜，但其阻碍和反对民主革命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昭彰；而1903年后，保皇派又舍义逐利，在商场欲海中弄得本派四分五裂、声名扫地，比如1907—1908年发生在美国芝加哥债务纠纷案，就沸沸扬扬；而同一时期，康有为挈其新妾、女儿遍游亚、欧、美诸名胜古迹，所费不貲，众情不服。加之，保皇派筹资以再兴勤王师事，容亦因此而力促其成，但实际上康有为等此时毫无动作，这和容闳强调的“勿为大言，只求实际”^②相背离。所以容对康的不满之一就是敛财自肥，不可信赖与依靠；而保皇派虽一再改换名目，却因内部腐败分裂，在1905—1907年的两派论战中又遭失败，社会影响自是日趋减缩，在人们心目中，显然已非昔日那种主导社会力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进入它的盛年，1905—1908年同盟会策动的系列武装起义虽历遭挫折，但革命党人仍不少屈，积极策划更大规模的起义，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因而盛播海内外。容闳当系有感于此，始舍康倚孙，冀以红龙计划来促其成。

复次，基于“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容闳很注视人心所向。他在1911年12月19日的一封致革命党人的信这样说：“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4—325页。

②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115页。

声音，他们就对了。”^① 容闳于 1902 年 5 月由香港再返美国后，未再回到祖国，即使对国内情况不全了解，至少对美洲情况是比较清楚的。1909 年前，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发动西南边疆起义，主要倚靠南洋诸地为基地，对多尚困于保皇说的美洲华侨争取不够。到 1909 年，孙中山等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饬所有在美洲的同盟会员都加入致公堂，以扩大革命组织和思想影响，并在演说中强调“亡国人无世界位置”，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建立新国，“开浚财源”，才能解决“中国生计维艰”，免得“作外人篱下之计”^②。即把进行革命和中国近代化、华侨利益连在一起，结果，“说者谆谆，而听者津津”^③，受蔽于保皇说的华侨群众纷纷觉醒，转投革命。

革命先驱者首先听到人民中的虽则微弱乃至潜在的却富有生机的呼声，这种呼声由于适乎时代潮流，必然日益响亮。先驱者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应声而起，按人民的意愿而行动；而且要尽可能以之启导后进群众，形成一支足以摧垮旧的统治、扫清历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新的群众队伍。容闳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较孙中山等一批革命党人较迟闻到这种呼声，但他终于在 20 世纪初闻声而动，仍可列入先驱者，其典型意义在于：他作为一个浸润西方思想而又一心热爱祖国、胸怀人民的知识分子，其谋求中国近代化的呼声，在上述三个重要抉择中，都作出了较佳抉择，发出了合乎时代的高音，堪称谋求近代社会发展诸种情形中的一种可贵典型。十分强调“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④ 的孙中山，在 1900 年就称赞容闳“在国内也颇孚人望”，堪可作各派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325 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补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年版，第 121—123 页。

③ 《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建国月刊》第 6 卷第 4、5 期合刊。

④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28 页。

的领袖^①。1912年2月，他在致容闳函中又表示：“逖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恳请容归国参加民国建设，“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②。这些表明了他对容闳的长期尊敬和倚重。它还表明：这两位都是接受美式教育的人物，因阅历不同和对中国社会了解的程度不一，故其具体行径稍有差异；但他们都以中国新生和近代化为执著追求目标，都力图把西方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这就使得他们在行进途中有多个相似点和接近点，并最终欢聚于民主共和大旗之下。这又反映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和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的最好归宿。

(1999年)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4页。